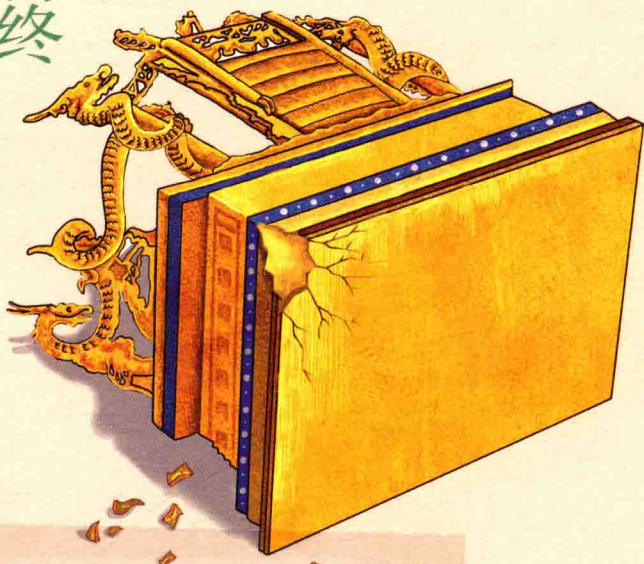


王朝的终结
丛书

金满楼 著

天命所终

衰亡 大清帝国的



大清帝国

晚清皇族和旗人是否真的堕落不堪？轰轰烈烈的清末新政为何成为昙花一现？
摄政王载沣如何使大清皇族“软着陆”？

是谁扣动了两千年封建帝制结束的扳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命所终

大清帝国的 衰亡

金满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 / 金满楼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7
(王朝的终结丛书)
ISBN 978-7-214-19164-9

I. ①天… II. ①金…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433号

书 名	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
著 者	金满楼
责任编辑	朱 超
装帧设计	壹诺设计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164-9
定 价	35.00元

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二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2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



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转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清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五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五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挑战。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清朝有些例外，其外部的挑战来自于新的时代与新的世界。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五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除了清朝，其他四个王朝的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就清朝而言，最后的革命是由于改良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清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和一位作家对历史的演绎，代表着他们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在阐述历史的规律和理论，叙述与议论各有不同的视角，对历史的看法和文风也不尽统一。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徐兴无

2016年5月于南京大学

前言

八旗与旗人社会

明清鼎革之际，满人夺取天下，不能不说带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以事实论，灭亡明王朝的并非满洲八旗而是天灾及由此蜂起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之际，很可能又是一场瘟疫让大顺军丧失了战斗力。从历史偶然性的角度上说，“清取明而代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势而为的机巧之举。

不可否认，满人的胜利确有“乘人之危”的嫌疑，但其入关时不过20万兵力，这说明八旗铁骑确有可畏之处。可惜的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八旗入关时本为强悍之师，清廷历代统治者也希望旗人聚合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集团，以长久保持旗人的勇武精神并让统治延续更久。但事与愿违的是，清廷对八旗的“包养”政策最终令旗人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特殊利益人群。清朝建立数十年后，八旗即丧失锐气，他们不再是帝国的军队主力，而仅仅是作为征服者的象征存在。

1799年，嘉庆在一道上谕中对此深感忧虑：“朕于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驾南巡至杭，营伍骑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虚发，弛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此数年来果能精炼乎？”六年后，嘉庆再次训诫：“各省营员大者养尊处优，小者偷安徇利，当募补兵额之时，即不认真挑选，率以市井游惰之徒充数。入伍以后，又不勤加训练，其所谓按期操演者，不过列营布阵，炫耀观瞻，循行故事而已。”时人昭槤更是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守卫宫门的侍卫们平时并不携带武器，“每夏日当值宿者，长衫羽扇，喧哗嬉笑”，圆



明园侍卫“乃竟日裸体酣卧宫门之前”。

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曾在《综核名实疏》中这样描述京城八旗：“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再如华胥大夫在《金台残泪记》中所描述的：“（京师）数百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海盗图奸，或又甚焉。”

旗兵如此，王公贵族也是如此。光绪朝的怡亲王溥静当时就闹了个笑话，他老人家为免去佩刀的累赘而发明了一招，刀鞘里无刀而只有刀把儿，这样一来，重量是大大减轻，尚武精神可就荡然无存了。作为昔日的军功阶层与清王朝的支柱，这些八旗后裔在清朝两百多年后早已堕落为无用的鸡肋，其“睹旌旗而色变，闻鞞鼓而心惊”，非但无任何军功可言，也实在无事可做。

19世纪中叶，清廷支出的军费高达三千万两白银，八旗与绿营平分秋色。在很大程度上，八旗、绿营并没有作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出现，而是作为“军费”享用者的角色出现。太平天国之役后，作为“立国之本”的他们实质上成了清廷的负担而不是其他。如甲午战争时期，包括防军、练军、地方勇营的前线军队约三十六万人，而数量大体相当的八旗、绿营却只能在一旁观战。

当然，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一些旗兵的表现也可以称得上英勇，但结局大体都败得很惨。如鸦片战争中乍浦的旗兵曾奋勇抵抗，战败后城内旗人多自殉身亡；太平军攻下南京后，大约有三万旗人被屠杀；后来的杭州之役也是如此，大约一万人被杀死或自殉。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张格尔之乱及同光年间的阿古柏之乱中，前往平叛的东北旗兵和西北旗兵也损失颇大。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的长期安定，八旗军队在承平岁月中悠闲度日，久而久之，刀枪入库，任其锈迹斑斑，格斗、射箭等技艺也日益荒废。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的迅猛发展，这些古老的技艺更是成了无用之技。加之职业和驻地的限制，大多数旗人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在吃喝玩乐、养鸟唱戏等方面或有建树，但娴长骑射、勇猛善战的民族特性却日渐丧失，战斗力也大为减弱。与其说他们是“军队”，倒不如说他们是“市井游民”来得更恰如其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廷对满人的优待是一种“甜蜜的桎梏”。发展到最

后，所谓“旗人”，即闲人也。

当然，就王朝的命运而言，旗人社会的空心化还不是最要命的，其中作为金字塔顶尖的皇族空心化才是最致命的。在慈禧太后当政的近半个世纪中，皇宫里再也没有听到婴儿出生的哭声。这种史无前例的宫荒，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而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气数已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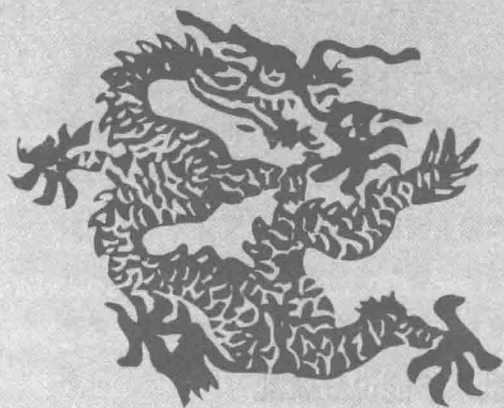
「目录」

天命所终：
大清帝国的衰亡

第一章 宫荒：王朝的气数已尽.....	001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002
皇帝被坑：“围园杀后”中的惊天密谋.....	008
光绪之死：千古疑案中的合理逻辑.....	016
第二章 新贵：权在手来把令行.....	025
新君继位：为什么是溥仪.....	026
隆裕：皇后终于熬成了太后.....	032
摄政王：载沣上任一把火.....	042
军权在握：打虎还得亲兄弟.....	049
靠边站的学问：亲贵见用贤才弃.....	057
授人以柄：“皇族内阁”大败笔.....	065
第三章 旗人：革命政治下的牺牲品.....	073
甜蜜的桎梏：锋芒褪尽说八旗.....	074
历史负资产：九世之仇终不忘.....	081
举火者：“扬州十日”的真伪之辨.....	090
旗人很穷：“铁杆庄稼”叮当响.....	103
满汉畛域：长痛，还是短痛.....	112
动员令：驱除鞑虏的作用与反作用.....	121



第四章 风暴：乱世谁顾小民哀	133
喋血的革命：这一切看起来并不美.....	134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145
和平之路：越激烈的反而越宽容.....	153
第五章 风暴过后：一地鸡毛	165
祖宗啊祖宗：清帝退位的瞬间.....	166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174
逊帝溥仪：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185
各顾各命：旗人的乱世飘零.....	191
余 论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悖论与常理.....	207
附 录 清末民初旗人大事记.....	215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7



第一章

宫荒：王朝的气数已尽

1908年7月的一个傍晚，窗外突然有大光亮，同时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非鸟。只见天上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如巨雷，尾长数十丈，光芒耀眼，速度很慢，在哗哗破破的爆裂声中，最后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目睹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坠落，要出大事……





御史尸谏：皇位世系不能说乱就乱

光绪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当西北的漫漫风沙袭往京城之时，一位名叫吴可读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庙中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州官驰报，京城哄动，众人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疑问：吴可读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玄机与隐情？

自古以来，官员自杀原本并不稀奇。官场上也难免制造一些失意者。这些人或畏罪自尽，或因亏空催逼而自寻绝路。极少部分人甚至因为升迁无望、有志难申而轻率地了却残生。这官场上的死亡事件千奇百怪，自杀还真不能算个稀罕事。

但这一次，这位道光朝老进士的死亡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他选择的自杀地点与时间似乎出于精心选择，甚至是有意而为之：就在同治皇帝惠陵的毗邻，而且正是同治皇帝与皇后梓宫（即灵柩）移陵大典结束的当晚。

非常时期的非常死亡，难免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六品老官员按例并无参加移陵的义务，而据其官长事后的追述，吴可读随同吏部参加祭礼原属主动要求，因其对先帝至忠至哀方获允准。如果事实如此，读者心里或许会心存疑惑：既然吴老进士“至忠至哀”，那他为何要在此敏感时期，选择在同治陵墓的附近做出此等不敬乃至惊世骇俗的举动呢？

七十老翁何所求。按官场惯例，已近七旬的吴可读完全可以告老还乡，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但他最终选择了曝尸荒野，不得善终。可以肯定的是，吴可读的自殉绝不是无由头的自寻短见，其非常之举事前即有计划。这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谏议方式：“尸谏”。

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吴可读留下的遗疏上。在这道生前即已拟就的折子

里，吴可读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皇位承统的头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酿成“纲纪不振、礼法大坏”的巨患。有鉴于此，他决定“以死相谏”，以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确保新皇帝光绪在将来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以防止因同治无后而紊乱皇位世系。

遗疏中，吴可读称自己“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即同治）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大行皇帝所赐”。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湫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由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为今之计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唯有如此，大清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四年过去，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据野史传说，慈禧太后接到吴可读的遗疏后勃然大怒，其当场掷折于地，并拍桌大骂：“不要让此獠走掉！”身旁大臣从容上奏，说此人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妥当，现已从容赴死。慈禧太后听后大为震惊，其捡起折子拜读再三后，最终被吴可读的忠诚所感染，并勾起了对亲生儿子同治早逝的伤心往事。

时间拉回到四年前。在1875年那个酷热的夏天，紫禁城内哀声四起，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在患天花之症一个多月后不治身亡。同治（即载淳）生于1856



年，他既是慈禧太后的唯一所出，也是咸丰皇帝的唯一继承人。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后，年仅5岁的载淳被推上皇位，是为同治。

同治继位不久，慈禧太后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一举推翻咸丰死前所定的“八大臣”辅政制度，并在清朝历史上首开“太后垂帘”之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本意，或许是因为“八大臣”危及了皇权，而其垂帘听政的最初设想，也只是为了代儿子看管江山，日后仍要大政奉还。但令人失望的是，同治皇帝自幼天性顽劣，不好读书，待到亲政之时，读折仍不能成句。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要命的是，同治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这给皇位继承出了个大难题。同治驾崩当晚，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及诸位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讨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会场上，丧子之余的慈禧虽说悲痛却也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当下之计也只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毕竟，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乃至天下大乱。

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变得极为棘手。首先是名分问题，中国自古讲求“名正言顺”，如果名分不对，难免引发极大的混乱。对此，与会的亲贵、重臣们私下里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究竟谁才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同治留下的帝位呢？

按通常做法，如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的话，皇位就可以继续传袭，帝王世系也不会紊乱。从辈分上说，同治当时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应该从“溥”字辈中挑选一个候选人，来充当同治嗣子并继承其皇位。

但是，众人将“溥”字辈人选在心中再三捋了几遍后，却发现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一人，即道光皇帝长子奕纬的孙子溥伦。但是，溥伦当时未及周岁，年龄偏小，能否养活尚是问题。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出在血缘上，因为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养子。因此，从血缘上来说，溥伦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时，其很快遭到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反对，而慈禧对此也不同意。据揣测，慈禧反对溥伦继位的主要原因是：如

果溥伦承继帝位的话，慈禧势必成为太皇太后，无法继续垂帘听政；而垂帘听政的将是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而这又是慈禧太后所厌恶的人。

据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的记载，两宫太后在同治驾崩一个时辰后即召诸臣入，问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人主张“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不敢有所主张，于是斩钉截铁地宣布：“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必勉强。醇亲王奕譞的长子已四岁，又是至亲，由他继位最合适。”

听了这话，醇亲王奕譞大惊失色，当场倒地晕厥（真晕还是假晕无从得知）。对于慈禧的决定，与会诸人面面相觑，但要反驳又说不出所以然，同时也找不到更好的合适人选。于是，众人只好陷入了集体沉默。恭亲王奕訢见奕譞晕倒，使命太监将之扶出。在主要的当事人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离场后，其他人再无异议。于是，奕譞长子载湉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的下一步计划，宫中随后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据记载，当晚“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还不满4岁的载湉尚在睡梦之中，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接到了皇宫。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光绪”的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一系传下来的皇位。对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里虽颇有微词，但慑于慈禧太后的威势，当时也无人敢公开表示反对。

立载湉为新皇帝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载湉和载淳是同辈堂兄弟关系，这样做等于由传统的“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这在继位制度上与礼法不合，势必引发皇帝世系的紊乱。从明朝历史来看，因礼法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的案例屡有发生，其结局大多以悲剧而告终。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往大里说，合乎礼法的皇位承续乃数百年立国之本；往小里说，这也是朝政正常交接运转的根本保证。

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七弟，但这并非慈禧太后选择其子载湉为皇位继



承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奕譞的好运气主要来自于他的福晋，因为后者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如果单纯地从皇族血缘之亲近来说的话，载湉当时未必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问题的要害在于：宗法制度如何解决？

慈禧太后所提出的折中方案，其要点有两条：一是宣布载湉承续的是咸丰皇帝的皇位，她仍以皇太后的名义承担将小皇帝抚养成人的责任；二是光绪将来生子之后，其子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以此将继位名分及皇帝世系的问题加以纠正抹平。

就实用主义而言，慈禧太后的方法尚称切实可行。不过，由于以往并无先例且有违祖制，因而言官们在背后不免议论纷纷。光绪继位初年，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其在对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的安排表示颂扬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要求，即请求慈禧太后立下铁券，昭告天下，以免此事在将来旁生枝节。

“铁券”典故出于宋朝初年。据说，昭宪太后临终前告诫宋太祖赵匡胤，宋之所以得天下，“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太后之意，赵匡胤的儿子太小，其“百岁之后”当传位于其弟，以避免周覆亡之前鉴。赵匡胤表示遵从后，昭宪太后又命宰相赵普制立誓书，“藏之金匮”，以保证之后再传位于太祖长子赵德昭。但是，这种“兄终弟及”之后再“还政归本”的皇位继承方式显然是昭宪太后与赵匡胤的一厢情愿，因为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即违背诺言，他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即宋真宗），嫡长子继承制再次成为主流。

慈禧太后未必充分知晓前朝故事的利害关系，但她心里也清楚，这次的皇位安排虽有不得已之苦衷，但毕竟经不起儒家宗法制度的严格推敲。倘若将此事公开讨论的话，恐怕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稍有不慎，即有无穷之后患。因此，慈禧太后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下发的谕旨中将广安疾言厉色地申斥了一顿，并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政治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4年后，正当慈禧太后以为人们已经遗忘此事时，“吴可读尸谏”事件在同治移陵大葬的敏感时期发生了。中国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行为。譬如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狱”一案，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即便是吴可读的“尸谏”

之举，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先例。

当时，军机大臣王鼎弹劾朝中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后，其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亡，朝野为之震惊。由此，当时的清流党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并称其为“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在这些人眼中，吴可读是一个真正崇高而赤诚的殉道者，其非常之举，绝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事已如此，慈禧太后只得颁下谕旨再次申明，光绪生子后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事无更改；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命廷议加恩按五品官例议恤。

天语褒奖后，清流们随即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内为吴可读设奠开吊。那天的场面可谓规模空前，盛极一时。上至大学士各部堂官，下至各衙门一般司员，馆外素车白马，前来吊唁者人流如织。就连一向自视甚高、持名清贵耿介的翰林御史们，也都自发地代丧家接待吊客，场面极尽一时哀荣。

众多的挽联中，翰林院编修黄始楫所撰最为传诵一时：“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此联颇有些说法。这年三月下旬的某日午后，京城忽然飘起“太阳雪”（白日飘雪），时间虽短，但亲眼目睹、亲手触碰者大有人在。异事发生后，京中人议论纷纷，以为近日必有奇冤（如家喻户晓的《窦娥冤》之故事）。直到“吴可读尸谏”一事发生，士林遂将之比附为“奇节”而不是“奇冤”。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坏土已成黄帝鼎，前星犹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处，五更风雨蓟门东。”

吴可读死后，其生前所做的这首殉道诗在光绪年间为士大夫们广为传诵。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吴可读的死虽然换来了慈禧太后的政治承诺，但这个看似圆满的安排在后来却再次遭遇了变数。而这次的问题，出在光绪身上。